

李六如与他的《南通视察谭》

◎庄安正



李六如

张謇缔造的南通模范县,很早就引起各界人士关注,推动他们开启南通参观行,不少人士还撰写文章,向社会公开自己的心得体会。自从杨天骥1908年10月在《舆论日报》上发表《地方自治之模范村》,到张謇去世后,爰村1949年9月在香港《大公报》上登载《希望大家向张季直先生学习》,40余年中,可谓绵延不绝。其间,由李六如撰写并在1921年1月长沙《大公报》上连载的《南通视察谭》,便是同类文章中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且具有特殊价值的一篇。

对南通“模范县”的仰慕,促成了李六如的学习取经之行

李六如(1887—1973年),湖南平江人,原名宝良、抱良,以字行。1908年到湖北参加新军,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赴日本留学。1918年回国后,又变卖家产,在家乡进行实业、教育救国等实验,可见他当时是一个具有较高学历、丰富阅历和强烈爱国情怀的青年。“视察”有两种含义,一指官员到下级机构或现场检查指导;二指考察、察看。《南通视察谭》中的“视察”,显然是指第二种含义。文章没有透露作者到访南通的具体日期,但据发表时间推断,大概率是在1920年下半年成行的。对南通“模范县”的仰慕,促成了作者这一次的学习取经之行。到访之际正逢南通“模范县”鼎盛期,李六如抵通后,面对一路繁花,细心考察,认真听讲,随时记录,最后梳理思路,修改成文。该文篇幅长达13000字,在《大公报》上连载18天,实为同类文章中少见。

纵观全文,该文具有三大特色。第一,内容广泛。张謇创办的救国事业包括教育、实业、慈善三大类,每一大类中又包含众多小事业。三大类以及大多数小事业在李六如笔下都有所体现。然而,李六如首先介绍的还是南通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情形,然后再按顺序将上述大小事业分别描述。如此安排,是考虑到读者群主要是湖南籍,方便千里之外的湖南读者一开始即能贴近南通,对张謇救国事业的背景有一基本了解。第二,描述真实。完成一篇万言长文需要用心用力,对文章中的内容给予准确的描述更属不易。张謇的三大类事业彼此关联又独自存在;每一大类中的众多小事业创办的时间不同、背景不同、名称不同、过程不同、经营方向不同、成效不尽相同、积累的数据不同等等,李六如都尽可能给予了清晰的描述。这种务实的行文风格有利于读者产生可信度高、贴近事实的印象,乐意接受。第三,文笔细腻。洋洋万言的篇幅为李六如提供了着眼整体,又从细微处落笔的空间。李六如对张謇大小事业的如实描述往往包含具体细节。部分细节甚至为作者独家披露、首次面世,客观上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供后人在相关研究中参考。这种细腻的文笔,对于读者,是对南通“模范县”形象的生动宣传;对于作者,则是钦佩张謇救国事业之情在笔端下的真实流露。

李六如文字中对南通社会现象的思考与分析,价值深重

与张謇会面交谈,是到访南通人士的普遍愿望,《南通视察谭》对此没有提及,令读者颇有些遗憾。只是这类情况在同类文章中并不少见,原因多种多样,与到访人士行程匆促,事先没有预约,或同期到访人士较多,张謇事务繁忙,或张謇当时不在南通等可能都有关联。尽管有此欠缺,但并不影响李六如的收获满满,也不影响他对张謇救国事业的钦佩之情。李六如的心愿是尽可能详细地将有关南通模范县的见闻介绍给读者,见闻构成了《南通视察谭》的主体。但是,李六如文章中还有一些对南通社会现象进行思考与分析的文字,篇幅不大,分量很重,这些文字也是体现《南通视察谭》的特殊价值之所在。

张謇1920年3月曾在《申报》登载的《张啬庵启事》中呼吁:“愿我父老兄弟继续来通参观者,直指某事疏,某事阙而辱教之。”李六如赴通前是否读过张謇的《启事》,不太清楚。但是,《南通视察谭》中这些思考与分析的文字,事实上形成了对张謇的积极回应。自然,这类文字涉及较多方面,很难用简单的是非对错一一加以评判。但文字中有两大要点,一是认为南通当时的教育、慈善两大类“均无确定基金”,基础不太稳固;二是认为张謇等“彼皆老矣。一旦云亡,其能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患乎”,都与张謇缔造的南通模范县能否延续光大的根本问题有关,不能不认为这是李六如针对性极强、极有见地的两个见解。事实上,张謇在救国实践中亦已逐渐意识到南通自身存在的这两大问题,并一直在设法补救。例如,从清末开始,张謇几次捐赠田产、分拨企业部分红利等,作为南通创办教育、慈善的基金。1920年10月,张謇又支持儿子张怡祖重建南通县自治会,希望借助地方团体中青年群体的力量,继续推进南通模范县建设,便是例证。只是,张謇的这些办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李六如敏锐地发现了这两类问题,除了学历较高、阅历丰富等因素外,到访南通前他本人在平江进行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实验(未获成功),对张謇的救国方案比较熟悉,虽属晚辈,但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同行的眼光进行审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李六如的《南通视察谭》关注了张謇与南通,并给予积极评价

《南通视察谭》的特殊价值,还与作者的生平与身份有关。1920—1921年,李六如正处于人生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就在《大公报》连载《南通视察谭》的当年(1921年)秋天,李六如由毛泽东、何叔衡亲自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稍后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早期党员。

如果说,张謇是中国共产党人诞生前寻求救国真理的杰出代表,那么李六如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寻求救国真理,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优秀分子。双方的共同点是爱国救国并为之努力奋斗,但由于近代国情复杂,加上两人的阅历与信仰有所不同,彼此的救国方案亦存在若干重大的差别。李六如留学日本期满回国时,随身携带一部日译本《资本论》的细节,即预示着他不可能完全认同张謇的南通模范县方案。文章中有一段南通“普通社会固能各安其业,无投闲置散之忧,然实则沾利虽普,而却不甚厚,对于工人,时间过长,工资过少”等文字,即反映了李六如对南通普通民众以及企业内工人的经济地位等存有一些微词。文章末尾,李六如对张謇作出了总体评价,亦道出了撰写本文的目的:“但愿阅者诸君悉心审察,举其所长,弃其所短,各邑如南通,尽人如张謇,则吾国千七百五十四县俱为乐土,何患乎无郅治之隆也!不观以上诸篇乎?通非天然极乐之国,謇非三头六臂之人,毋亦坚忍耐劳,践实累逾,以至如此,其有闻风兴起者,则六如此行不虚,其所以贡献于社会者,亦深且大也”。

《南通视察谭》发表后,两人继续为实现各自的救国方案奋斗。1926年,张謇去世,人生定格为一个近代“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李六如则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竭尽全力。1930年,李六如奔赴中央苏区,担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家银行总行代理行长等。1937年,李六如奔赴延安,担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延安行政学院代院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等。拂去历史烟尘,回望《南通视察谭》,这篇文章正处在李六如由一个爱国者转化为共产党人的人生关键节点,留下了早期共产党人在成长过程中关注张謇与南通,并给予积极评价的鲜明印记。文章连同作者的这一特殊性,在众多同类文章中几乎独一无二,显得非常珍贵。

